

“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 兼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

王 宁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认为，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思潮处于共存和互补的状态，在这方面，后人文研究的意义显得日益突出。后人文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人机合一”现象，也即文学与机器的关系。作者分析了这种现象之于人类以及文学研究的利与弊，认为它的出现以及之于文学研究是利大于弊，只要我们掌握这一机制并且利用它来从事文学研究，就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尽管人机合一在某些方面可以替代人的作用，但面对复杂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它则无法全然取代人的作用。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 后人文研究 人机合一 人与机器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2-0119-09

早在2004年，我就针对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一书所酿起的轩然大波在不同的场合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我当时也没有料到，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已经冷却了几年的“后学热”也似乎有所升温。但此时由于文学和文化理论所处的不利境遇，我们已经无法再感

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理论热或“后学热”了。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这个话题时，我便想起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之特征。诚然，我们现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就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总体而言的。具体到经济上，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就整个人文学科而言，有人称其为“后人文时代”，而更为具体到文学和文化理论上，我则称其

为“后理论时代”。也许人们要问,为什么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后理论时代”呢?这正是我要据以探讨文学与机器之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一

首先,我想简略地概述一下“后理论时代”的特征。所谓“后理论时代”并不仅仅说明文学和文化理论衰落后的状态,这个“后”(post)既意味着时间上的“之后”(after),同时也表明了内涵上的“超越”(beyond),也即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它标志着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理论热”的大潮已逐渐消退,即使是最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理论也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它不可能恰当地用于解释世间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既然主要是来自于文学和文化实践,那就理应返回它应该发挥功能的领域。因此,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并没有死亡,只是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所向披靡和无所不能的效应,但它依然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既然目前所流行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是出自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实践,所以它在用以解释非西方文化和文学现象时就应该被“语境化”(contextualized),而且在特定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质疑和被改造,甚至受到建基于非西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实践的重新阐释。这就是“后理论时代”理论在功能和性质方面发生的一个转变。

其次,在“后理论时代”,所有的总体意识和中心意识都被解构,甚至分裂成了碎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君临一切,甚

至任何理论都很难持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它和其他理论的关系是一种共存和互动的状态。因此“后理论时代”又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自己可赖以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

再者,“后理论时代”在解构了袭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后,实际上为原来处于理论关注之边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向中心运动铺平了道路,从而打破了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中国的文学和理论的“非边缘化”尝试中见出端倪。^①

如果从“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机器的关系着眼,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后理论时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其中近十多年来在理论界风行的动物研究和生态批评就是两个最有力的挑战:对于前者我将另文讨论,关于后者我已在不同的场合作过较多的讨论,此处无须赘言。^②毫无疑问,“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纷纭繁复,群芳斗艳,各领风骚,虽不如理论的“黄金时代”那样耀眼,但依然有自己活动的空间。而面对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的衰落,不同的理论家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与伊格尔顿的悲观态度不同的是,美国文学理论家卡勒(Jonathan Culler)的反应比较乐观。他

^① 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标志,就是李泽厚的《美学四讲》首次收入国际权威性的《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二版。Cf. Li Zehou,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View,"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Vincent B. Leitch, 2nd ed. (New York: Norton, 2010), pp. 1748-60.

^② 我讨论生态批评的论文主要有下面几篇:《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生态文明与生态批评:现状与未来前景》,载《东方丛刊》,2010年第2期;《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 "Toward a Lite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A Reflection on Ecocriticism," *Neohelicon*, XXXVI (2009): 289-98.

除了否定“理论死亡”之说外,还就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的现状 & 未来走向做了清晰的描述。按照他的描述,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有这样几个方向: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也即传统的以结构主义的文本为中心的叙事学转向了更加宏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甚至与历史的叙述以及认知科学相关联。第二是“较多的德里达,较少的福柯和拉康”,这也说明了他本人对德里达的情有独钟;或者说,德里达所关注的对象虽然超出了文本,但依然很重视阅读和文本结构,这一点与卡勒本人十分相像;而另两位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多地将理论的触角指向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问题。第三便是“伦理学转向”,在经历了多年来的形式主义和文化批评后,伦理道德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因而当代文学理论中便出现了回归伦理学的倾向。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界还出现了对动物的研究,也即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有别于传统的文学伦理学。第四是生态批评,这虽然是卡勒本人很少关注或涉足的一个领域,但由于这一批评理论近年来声势浩大且影响面较广,并与当代人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也不得不给予必要的关注。第五是“后人文研究”(posthuman studies),在当今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面对机器的强大作用,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理论家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家的关注。所谓后人文研究(或译“后人类研究”)正是来自文学理论界的一种反应,目前这种反应方兴未艾。第六便是“返回美学”,或者说所谓的“审美转向”,这是当今的不少文学研究者呼吁了多年的一个方向;现在,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以审美为主的方向终于在卡勒这

里被权威性地提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①

二

以上我们简略描述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发展方向,这无疑为我们下面专门探讨后人文主义以及文学与机器的关系设置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有着较大影响的理论思潮,但仅从上面卡勒对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的总体描述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在上述理论走向的六个方向中有三种理论思潮都和本文所要讨论的“后人文主义”之关键概念相关。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文研究”呢?它与传统的人文研究有何区别?这正是各家学派所争相予以界定的一个方面。正如一篇评论沃尔夫(Cary Wolfe)的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的书评所指出的,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的核心论点呢?沃尔夫的整个计划也许可以总结为这样几句话,由于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所讨论的其他理论家和艺术家的著作,“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了一个新的位置,它已成了一个居住着我准备称之为‘非人类的居民’(nonhuman subjects)的场所。”(47)作者进一步问道,这些人那些会说话的兔子、六英寸高的人以及神话般的怪物吗?显然,在后人文主义者那里,人类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曾被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唯一有生命的物种,他和其他一些有生命的动物和自然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而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存的状态中,人类虽然地位显赫和特别,

^① 参见卡勒 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演讲,《当今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Today”),经作者同意,根据记录整理的英文原文刊发在《文艺理论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77—85 页。

但不一定永远是其他物种的主宰或主人,他有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界其他物种或受到后者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早已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描写。最近十多年来自然界发生的一系列灾害,不就是大自然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一种挑战和报复吗?人们虽然已经习惯于与天奋斗和与地奋斗,但真正面对自然界的报复和巨大灾害时有时却显得十分无力。因此人类已经开始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了,动物研究和生态批评的兴起就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率先作出的反应,因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自己所生存的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也最容易将自己的感受和反应诉诸笔端。动物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实际上想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动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链,一旦这个链子断了,人类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最近十多年里出现的风暴的频繁、草原的萎缩、部分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等现象就是一些不测的预兆。

但是,毕竟人类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不断地试图改进生产力,发明创造出各种先进的机器,以减轻人类自身的劳动强度,并且造福社会和子孙后代。现代化的大计就是这样一种美好愿望的具体实践。正如本文标题所示,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日新月异,面对机器工业的发展和改进,人的力量受到了大大的限制,人类可以拥有任何发明创造,但人类常常却会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看法,“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新时代,而是对现代性所主张的一些东西的改写,也即首先是现代性所主张的基于通过科学技术从总体上解放人类的计划的合法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种改写已在现代性自身中

进行了很长时间。”⁽³⁴⁾人们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好的和坏的后果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牺牲了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所以在后现代时代,人类并非总能主宰自己和所居住的地球的命运,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依靠自然界其他物种或甚至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东西的帮助。本文所讨论的机器对人类生存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贝明顿(Neil Badmington)在一篇题为《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化》的论文中,描述了后人文主义的种种特征之后总结道,“总之,人是绝对区别于非人的,人高居于非人之上,处于一种自然的超级位置(natural supremacy)。”⁽¹⁸⁾这显然是他在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否将其用于探讨人与机器的关系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尽管人类的生存状态受到了种种挑战,但人类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与自然抗争和协调,最终比以往更舒适地生存了下来。自然灾害可以夺去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毁灭人类的存在和繁衍。这其中除了人类本身所固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外,也有一些感情的东西在支撑着人类的生存,文学就是人类可赖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一种媒介。诚然,在后现代时代,机器在某些方面能够代替人从事一些本来由人来从事的劳动,但是在复杂的脑力劳动中,机器往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同样,当人类进入电子时代后,机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旧时的超级庞然大物——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巧玲珑和轻便易携,但是它储存的信息量却更大,拥有的功能也更为多样。因此有人断言,在跨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人工的翻译逐渐成了多余之物,因为机器翻译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人工翻译。但是任何熟悉谷歌的翻译功

能的人都马上会用相反的例子来证明,在翻译复杂的带有很浓的文学味的文本时,谷歌的翻译软件几乎没有一句不出错,更无法译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象征寓意。至于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以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样文体极为复杂的意识流小说,恐怕再先进的翻译机器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些文学作品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具有不同知识装备和不同本领的人可以从中取出不同的宝藏,而对于那些不具备人类的高级智力的机器人而言,它们的宝藏就难以得到识别和发掘。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文学是有着深厚学养、高雅情操和熟练文字技能的人所独创的,有着不同文学修养和文字水平的人能够创造出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这是包括机器在内的任何其他传播媒介都无法替代的。

多年前,我在和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前任主席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的一次访谈中,就涉及到了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当我们谈及未来文学的命运时,这位一生酷爱文学、并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瑞典诗人指出,文学在未来的世纪是不会消亡的,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所赖以生存的语言媒介的作用 is 任何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人们不可能通过看电影和电视来欣赏文学作品,他们需要阅读文学作品,从中获得审美快感和艺术享受。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王宁,2000:402)同样,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人文主义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后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但正如贝明顿所指出的,“如果为了吁请策兰,仍有一些超越人类的歌要唱的话,那么后人文主义便标志着对这一事实的认可,即人文主义尽管已经与其自身总是显得不

和谐,但是却永远听起来像是别的调子,像是别的继承者。”(22)应该说,后人文主义就是人文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一种自然延续和变异:它不可能全然摒弃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所有东西,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又不得不与其谈判、协商和协调,最后以后人文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恐怕是所有“后学”都带有的“妥协”和“超越”之双重特征,后人文主义自然也不例外。

十多年前,美国文论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在谈及比较文学的未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形塑后殖民、后民族,全球大学方面,正在由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各种变革使人们很难界定和理解,部分原因恰在于我们就置身于其中。然而,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革命却显然使得手稿转向一种印刷文化,这种变化是激进的和不可逆转的。电邮、传真、计算机化的图书馆目录,在电脑上写作而非手写或用打字机打字,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和网络来发指令,因此常常作为一种商业企业,越来越多的资料都可在线获得,线性的平面媒体向多媒体超文本转变,在网上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使得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所有这些都正在迅速而不可变更地改变着专攻文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老师和学生的工作方式。(8)米勒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曾以中译文的形式在中文刊物上发表,并引起一些争议,但现在看来,他的上述预言已为近十多年来的实践所证实。显然,米勒较之埃斯普马克更为与时俱进,他也是毕生酷爱文学,并花了大半生的时间从事自己所钟爱的文学研究事业。但米勒的不同之处在于,上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物理学,后来对文学的钟爱使他改学文学专业,但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停止对当代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他并不希望看到新的科技发展会导

致文学的终结,因为较之科学,他对文学有着特别的钟情。作为一位同时也熟悉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学者,他面对这些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也感到无可奈何。正是由于米勒不同于那些恪守人文主义传统的老学究,他从不抵制新的传播技术,而是迅速地掌握新的技术以便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因而他在年过古稀之后依然有效地掌握了电脑技术,写下了一部部学术著作和大量的文学批评论文,并且通过邮件与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的学术同行进行交流。但米勒的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我们就置身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并预示了当今时代的人机合一(cyborg)的现象。这也正是本文最后部分所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三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谈论人机合一现象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因为人机合一的现象已经在今天不少人的身上出现,甚至成为他们得以更好地生活和更为有效地工作的不可取代的东西。例如心脏病人体内安装的起搏器、近视眼患者的隐形眼镜、瘸腿人使用的拐杖,以及耳聋者所使用的助听器等,这些都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提高人的生物功能的方式。至于载人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功能,则更是标志着这种人机合一一体所发展到的最新阶段。那么我们对人机合一一体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它之于人类究竟是福还是祸呢?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是对之作进一步了解还是颇有必要的。

根据维基百科上词条的解释,所谓人机合一,简言之,就是一种“受控制的有

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它是一种同时带有生物和人工(如电子、机械或机器人)增势的存在物”。^①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和克莱恩(Nathan S. Kline)于1960年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当时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外层空间中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之优点。(26—27)之后,哈拉希(D. S. Halacy)在出版于1965年的《人机合一:超人的进化》一书中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介绍,他称之为“新的前沿”(new frontier),其原因恰在于它“不仅适用于空间,而且还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内部空间’与‘外层空间’的关系,也即起到沟通精神与物质的桥梁作用”。(7)就这一点而言,它带给人类的应该是福祉和便利,或者说至少是利大于弊。1985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机合一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女权主义》的论文,尽管她讨论的更多是女权主义遭遇的问题,但由于她使用了这一术语,因此她本人也就被看做是当代后人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家之一。

虽然人机合一一体开始时只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但很快这种设想就被付诸了现实。人们发现,这种人机合一的机制可以并且甚至已经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诸如社会控制网络,医学上的增势和恢复功能,也即帮助病人恢复失去了的功能、器官和四肢等。有时得到增势的人机合一一体不仅使人能够恢复失去的功能,甚至还帮助人获得一些本来并不具有的新的功能,例如诞生于2004年的全功能的人工心脏就是一例。可见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面前,人的力量再也不如以前那样强大和不可一世了,它不仅受制

^① Cf. <http://en.wikipedia.org/wiki/Cyborg>.

于自然,有时甚至也受制于自己发明创造出来但却无法驾驭的东西。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到当下,这种人机合一的装置就越是先进,它甚至能调节人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给人以力量和智慧,掌握并延缓人的生老病死的节奏。这样看来,大写的“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人类进入了“后人类”时代,在这个时代,和人类共存共生的不仅仅是一些高级动物,还有自然界中的有生命的生物,此外还有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出来的机械。人只不过是自然界中的重要一员,而不像以往那样是不可一世的主宰。人也受制于自然法则,受制于其他物种。由此可见,人机合一的诞生从另一个角度也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消解。

也许与人机合一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学艺术,因为艺术家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设计出各种人机合一的机制,因此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而在现实中,则有一种人机合一的艺术家,但这样的艺术家应当首先仍是具有人性和人类的各种情感的艺术师;尽管他们也许依赖机器的辅助才得以生存,但是支配他们思维和行动的仍主要是他们的大脑。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同时带有人性的东西和机器的因素,但前者是主要的。在所谓的“人机合一”中,人依然是第一位的,机器只能起到辅助人生活和工作的作用,但永远不能全然取代人。有些人认为,将来的艺术家也许可以从这种人机合一的机制中吸取和借鉴一些东西,而不必以机器人来全然代替艺术。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选择。当然,人机合一还用于通俗文化中,尤其是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表演艺术中。2010年,由哈比森(Neil Harbisson)和莱巴斯(Moon Ribas)创立的人机合一基金会(Cyborg Foundation)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机合一的国际组织,它的

建立旨在帮助更多的人成为人机合一体,以便使人具有更多的功能。由于这两人本身就是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他们创立的这个基金会使用来回不断收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信和邮件,在这些信件中,不少人都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和兴趣:希望自己也早日成为人机合一体。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人机合一的普及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它带给人类的应该是利大于弊。

写到这里,我作为一位专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人文学者,也不得不思考并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既然机器已经先进到了如此的地步,而且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帮助,那么机器与文学的关系又如何呢?它将给文学带来的是希望还是绝望?我想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希望和绝望并重,但最终仍应该是希望大于绝望。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不断更新,使得人们的写作速度大大地加快了。人们从开始酝酿到写作,直到完成一篇文章,然后排版并在网上先行发表,几乎完全可以独自地在工作室的电脑上完成。这样一来,便对传统的印刷业和纸媒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无须进入图书馆就可以在家里的电脑上查询各种资料,阅读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和报刊杂志。可见当代数字化的繁盛和印刷业的萎缩就是这样一个必然的后果。

因此,我们随便碰到下面这个不利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人一改过去那种阅读习惯,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阅读器甚至手机。当然,这是十分便捷的:人们出差在外无须携带沉重的书籍,只须携带一只轻便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尽情地遨游在时事和文学的海洋中,尽享古今中外的文学风情,尽观各种最新

的影视节目。此外,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与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流。因此这种形式的人机合一也给传统的电影、电视以及邮政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这样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机合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由于整天在电脑旁工作,甚至在休息时还在手机上发信息或玩游戏,久而久之,他们的视力便不可避免地下降,于是不得不依赖各种眼镜来帮助自己阅读和写作。更为糟糕的是,诸如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炎等一些数字化时代特有的“电脑病”也早早地降临到年轻学生的身上。对于这一现象,不少儿童家长深感不安,他们通过各种途径阻止自己的孩子接触这些先进的东西,强迫他们认真读书以便将来能够在著名高等学府深造。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青少年的喜好和逐渐养成的习惯,因为他们既然生活在这个有着人机合一趋势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第四个后果便是同时出现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现象:由于新一代青少年是玩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长大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艺术已经逐渐陌生,甚至连汉字都写不好,这就好像许多美国的学生拼写单词老出错一样。这无疑令人悲哀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书法最终将进入博物馆,而代之以则是通过电脑制作的“反书法”的后现代书法艺术的诞生。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老一代学者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学者,至少是人文学者,并不会全然摒弃书法,只是书法本身的实用功能将大大萎缩,而其艺术和收藏价值将会进一步提高。

如果说上述前二者主要是利大于弊的话,那么后二者则是弊大于利,因此是祸福并重。既然人与机器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

是希望和绝望的并重,那么我们该以何种对策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之于文学的有效作用呢?这正是我在结束本文之前需要简略回答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文化人,我们应该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近况,以便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具体到文学研究,我们确实应该熟练地掌握基本的电脑浏览、邮件往来和写作技术,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我们通过书信来往和手写文章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电脑上改定的文稿可以直接发给出版机构排版和印刷,也能节省纸张,减少垃圾的排放量,确保我们的低碳生活得以持续。

其次,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知识主要靠的是长期的积累,我们的学术洞见也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积累基础之上的深刻思考。我们所说的厚积薄发主要是就人文学者而言的,因此人文学者的学术生命应该说要长于那些专事应用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学术生命。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能够传承给后代,我们有时确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包括这种人机合一体,来保持我们的健康和延缓我们的学术生命。因此,较之药物保健和治疗,也许机器更为有效和不带副作用。

就在我行将结束本文时,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奇文,说最近在美国发明的一个机器人(比人机合一体更为先进)三十秒钟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而且每天都在各大网络媒体上产出报道,今年预计将发出150多万篇报道,在体育比赛、股票市场行情、房地产价格等方面的报道,颇受人们青睐。尤其在体育报道上表现抢眼,机器人在比赛结束“那一刻”写出来的总结性报道很快就成了各个网络媒体体育

板块上拥有最高点击量的文章。^①

当然首先听到这个消息感到紧张的是记者,因为他们的写作所需要的“短、平、快”和实效性是机器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我认为我们则不必太在意。我最后想强调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多义的象征和隐喻以及悠远的意境是机器人无法“搜”出来并加以贴切地表达的。而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也不必感到紧张,即使有再先进的机器帮助,我们也应该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建立在广泛的阅读之上,那种不阅读原文文本,只热衷于玩弄一些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理论概念的人,显然是得不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洞见的。再加之作为专事外国文学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向国内的外行作些粗浅的介绍,我们应更重视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面对面的或文字上的对话甚至交锋。这样看来,文学研究者自身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素质的提高,应该大大高于外来的帮助,甚至包括来自人机合一体的增势和帮助。

□

参考文献:

1. Badmington, Neil.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53 (2003): 10-27.
2. Clynes, Manfred E., and Nathan S. Kline.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September 1960): 26-27.
3.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Today." 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4.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2004.
5. Halacy, D. S. *Cyborg: Evolution of the Super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6.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15 (1985): 65-107.
7. Lyotard, Jean-François. "Rewriting Modernity."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1991.

8. Miller, J. Hillis. "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Tamkang Review*. 31. 1 (2000): 1-21.
9. Wolfe, Cary.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9.
10.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 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 100084

^① 参看光明网 2012年9月7日转自《钱江晚报》的报道《机器人记者30秒一篇文章 发明者有望得普利策奖》, < http://culture.gmw.cn/2012-09/07/content_5007864.htm >。

only ordinary people's personal and familial history but also the circulation mod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re used together to make the "first-class narration" in *Waterland*.

LIANG Zhan Multiple Narratives: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Sciences 90

Historically, western modern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French Saloon developed in the 18th century, which took a great part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stimulat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ong the French "*philosophes/gens de lettres*". Madame de Staël had established two approaches for our literary studies in her masterpiece "*On Literature*", i. e. the social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behind "literariness" pursued by the formalist theory, there is a deep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meaning: the liberty and perfection of "*L'esprit human*". In this sens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tion of literature and Jean Paul Sartre's "Engagement" theory. For literary narratives, religion and theology have continuously provided for us the different "*Weltanschauungen*" and fertile experiences of life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ology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ould also in turn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our methodologies in textual analyses. As a result, not onl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that rose in the 1980s and literary narratives become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gradually.

LIU Heng Social Poetics 98

Social poetics is a critical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to examine its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the genres in writing ethnography. Poetics means social action and strategies of social performance. Through its play in and out of the text, we can explore the modes of human actions, experience some common sensations and interpret cultural patterns. This article, from a retrospective approach, i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and to elucidate its three formal properties, namely, universality, textuality and social practicality. In additi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rol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of the concept as a type of paradigm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article.

YU Qi The Real 108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al which originates from Lacan and now has become the main coordinate in Žižek'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ically, the Real can never be totally symbolized, and it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to break out of the Symbolic. Žižek, however, does not push the logic of negativity of the Real to its extreme, about which the subject can do nothing. His central point is that radical change can and will occur by means of assuming the traumatic encounter with the Real itself. He argues that there are in fact three orders of the Real: the real Real, the symbolic Real and the imaginary Real. More recently, he re-writes the Real into the parallax Real. What he aims at is to develop a more radical approach to 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Real. Žižek's ultimate goal is to criticize global capitalism and make radical change possible.

WANG Ning Posthuman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chine 119

The present essay holds that in the current "post-theoretic era", various literary theories and cultural trends are in a state of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ing one another. In this situation, the so-called post-human studies are increasingly conspicuous. Posthuman studies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cyborg", which is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chine. Having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phenomenon to literary studies, the au-

thor thinks that it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disadvantages as long as we have a grasp of this mechanism with which to do literary studies. For it will achieve better results. Although cyborg might more or less replace the function of human beings, it cannot completely take the place of the latter in face of the sophisticated literary creation and studies.

LI Gongzhao **Machine and War Machine in American War Novels** 128

Machine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arfare, producing more killing power. Soldiers and machine have formed a cooperative and yet neutralizing relationship. Soldiers are operators of the machine, and also the objects operated by machine. As the former, soldiers make use of machine to eliminate enemies and win the war. As the latter, soldiers are parts of the machine, sacrificial and replaceable. They are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rators and victims of the war machine, killing and getting killed.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war novels have profoundly expressed this paradox. But compared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lives, war machine's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has drawn more attention of the American war novelists. Novels like *Three Soldiers* show that as parts of the war machine, soldiers could only cooperate with the machine. Anyone wishing to rebel will be crushed.

DENG Mingyan **Perception in Virtual Space** 134

Indubitably, virtual space is changing and reforming our whole life. By focusing on visual percep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virtual space and other high-tech products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 our perceptual experiences. The analysis is set forth from two aspects, perceptual objects and the forms of perception. Contrasting with traditional perceptual objects, cyber-products are information flux other than substantial beings. Related to this, our form of perception transforms from perception of appearance to perception of disappearance. By this analysis, I try to offer som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virtual space is at best an illusion of being. Non-worldly is its prominent property.

ZHANG Jinfeng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Utopian Novels in the 19th Century** 14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accelerating since the dawning of the modern age, and many cultural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their views on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fast development. Some optimists have applauded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and prophesied a glorious future for mankind; while some cultural scholars have challenged the "myth of progress", maintaining that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can bring unforeseeable or even tragic results for the whole mankind. Bellamy and Morris joined the debate through their Utopian novels *Looking Backward* and *News from Nowhere*, in which they revealed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machines: Bellamy glorified industrialized urban civilization based on machines, while Morris voiced his doubt of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advocating a return to the natural, healthy and organic country life. Their viewpoints are the embodiment of two typical attitudes of western people in the 19th Century.

LI Jin **On Terry Eagleton's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149

Terry Eagleton's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probes into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and rea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He notes that all literary theories consider literature as "event". In deconstructing the fictional, valuable, richly figurative, non-pragmatic and morally significant qualities of literature, Eagleton inspires the reader to reconsider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exts. He proposes the reading strategy of "structu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author does not authorize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and that the reader's reconstructing of the "event" is dynamic.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deepens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the reader's agency in interpreting the "event" of literature.